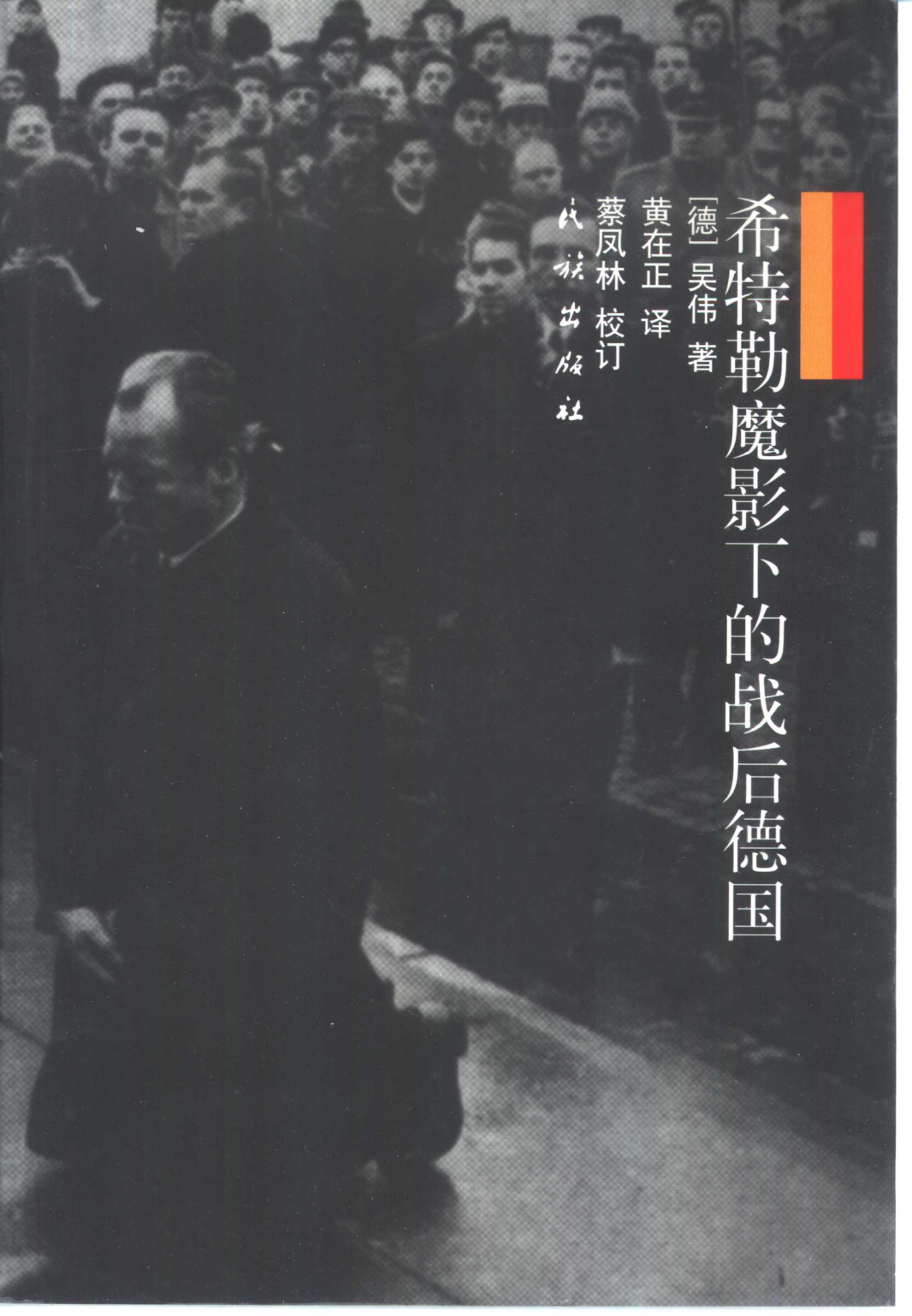




希特勒魔影下的战后德国

〔德〕吴伟 著

黄在正 译

蔡凤林 校订

民族出版社

希特勒魔影下 的战后德国

〔德〕吴伟 著

黄在正 译

蔡凤林 校订

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希特勒魔影下的战后德国/吴伟著. —北京:民族出版社, 2000. 10

ISBN 7-105-04080-7

I. 希… II. 吴… III. 法西斯主义—研究—德国
IV. D751.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43273 号

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和平里北街 14 号 邮编 100013)

民族出版社微机照排 迪鑫印刷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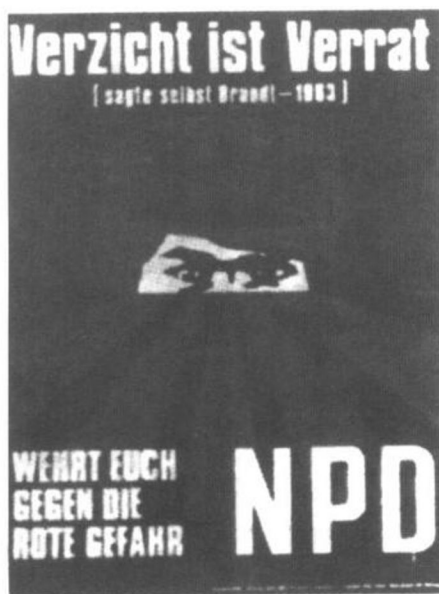
2000 年 10 月第 1 版 2000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7 字数: 170 千字

印数: 0001—3000 册 定价: 13.80 元

该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退换

(总编室电话: 64212794; 发行部电话: 64211734)



① 1949年在CSU联邦议会选举时采用的宣传画：亚洲人马上就要从SPD盾牌的后面扑向欧洲；

② 1953年，联邦议会选举时由杜巴特构思出的宣传画；

③ 1972年，联邦议会选举时激进主义右派NPD采用的宣传画。NPD采用了杜巴特的方案，使用新式语言讽刺勃兰特的东方政策（“灰心就是背叛”。1963年甚至勃兰特也这样说，要对赤祸加强防范！NPD），这些宣传画表现出了对西德战后政治上的基本姿态，即表现出了由对来自极其古老的威胁的恐怖（“东方的危险”、“亚洲的野蛮”）所支撑着的反犹太主义和反苏主义。



身着党卫军少校制服的
阿道夫·艾希曼。



1994年奥斯维辛的联邦国防军士兵。



这是1932年10月16日带插图的《工人日报》，首页上刊登的是约翰·哈特菲尔德的照片。图片下部正中央的文字是：九百万在为我撑腰（暗示着大企业支持希特勒）。



1970年12月17日，维利·勃兰特首相在华沙犹太人死难者慰灵碑前下跪。



这是联邦国防军中最大的武器提供者莱茵梅塔尔公司的首脑人物。在第一章的插图中纳粹法律学家们在用法律条款符号作成的绞套下面发笑着。在这些首脑人物的微笑中恐怕也包含着同样的心理。如果他们以冷峻的面孔提供他们的商品穿甲榴弹，那么他们真正的面目——死亡商人——之相就会暴露出来。因此，他们以微笑掩饰事情的严重性，把自己装扮成一般的商人，也就是说，他们把自己装扮成是为世界力量的均衡和为世界和平做出贡献的人。



1973 年在 CDV 联邦党大会上、从右面第2人开始，依次是路德维希·埃亚哈尔特、库尔特·比登克普夫、赫尔姆特·科尔，卡尔·卡尔斯坦斯，库尔特·基辛格。



华沙起义之后，国防军在处死波兰普通市民。▽

△1991年11月10日，年轻的右翼激进主义者们高呼“胜利万岁”、“把德国还给德国人”的口号，举着帝国战舰旗在哈雷大街上游行。这种现象曾出现在1938年的水晶之夜；而此时正是在1989年柏林墙倒塌之后。





科尔以“企业家的业绩和社会贡献”的名义把星级联邦功臣大十字勋章授予自己多年来的援助者——里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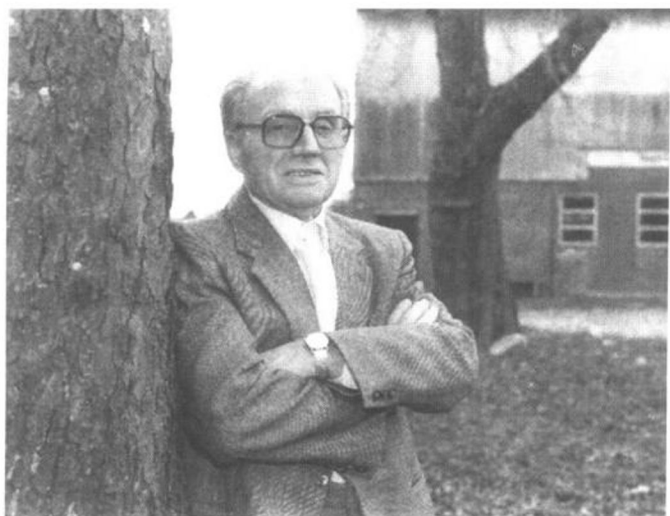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通货膨胀时期，迅速崛起的、并在两次世界大战中运筹帷幄，机敏地创造了西德经济复苏奇迹而斐誉德国产业界的“老巨头”——弗里德里希·弗里克。



1941年，“我作为一名老纳粹党员，是党卫军军官”；1976年，“我是领袖中的领袖”。曾经是里斯博士的汉斯·马丁·施莱亚博士。



据《法兰克福评论报》报道，弗朗茨·约瑟夫·施特劳斯曾经说：“取得这样的经济成果的国民，拥有拒绝听有关奥斯维辛话题的权利。”但他自己却认为没有说过那样的话，并坚持认为自己是清白的。这是具有亲密关系的施特劳斯和里斯。



弗利茨·布林格曼是原来的收容所囚犯，被称作非法的德国共产党(KPD)党员。KPD 停止活动后为合法的德国共产党(DKP)党员。他拒绝接受联邦功绩十字勋章。



民族法院的最后一名审判长弗拉伊斯勒。他公开审判了1944年7月20日暗杀事件的参与者，素以“冷血法官”而恶名昭著。



普鲁士法务大臣恺鲁尔访问司法见习官宿舍。这些法律学家们清楚，不是法律而是纳粹意识在统治着社会；随着法律失去价值，他们自己本身也失去了价值。失去价值是痛苦的，于是他们把法律条款的标记 S 吊到了绞刑架上，倒向强权者——纳粹党一方。开这样的玩笑，他们内心深处并不自在。这些人的笑是对那些不属于他们一方的人、即弱者和失败者；发呆的这些人，周身都表现出对站在正确的一方即站在权势一方的感情。

序 论

自 19 世纪末以来，西欧人也把日本人称为“亚洲的普鲁士人”。这个称呼一方面表现出西欧人对日本人所具备的那种富有责任感、纪律性和勤奋精神怀有的一种敬佩之情，因为日本人也和普鲁士人一样，被自己的这种特性支撑，创建了自己的社会。但是另一方面，这一称呼同时也是对这两种社会所凸现出来的官僚强权和根深蒂固的优等意识这一相同特征的隐讳表现。

从历史的角度来观察，称日本人是“亚洲的普鲁士人”，也是有其正当理由的。这是因为，除了日本的本土传统之外，决定明治宪法基调的就是“普鲁士的国家哲学家黑格尔”的国家理念和普鲁士宪法学家们的理论。明治宪法中鲜明地体现出来的国家主权论，就是 19 世纪德国国家论和宪法论的产物。其见解是，历史和伦理的理性，是由国家体现出来的，国家是一个有机的整体。

晚期形成的帝国主义国家德国，以及在亚洲首次成为西欧帝国主义国家竞争对手的日本所展开的穷兵黩武的殖民政策，是以国家的强权官僚体制和军国主义为基础的。1945 年的战败所遗留下的问题，如战争责任、

对国内外人民的罪行、对战争责任者的惩处、对死难者的赔偿，或者至少把死难者当作受害者给予正式承认，以及在冷战时期同战胜国之间的关系和再军备化等问题，对于两国来说也基本一致。

但是，在看到他们存在着这些共同点的同时，还应看到两国之间存在着不同点。从1969年至1982年的13年间，德国社会民主党（SPD）主宰了联合政权。这一政党的政治领袖们，同其前后掌握政权的政党领导人相比，与纳粹时代德国的犯罪行为牵连较少，因此在正视历史事实方面，他们容易发挥激情和能力。在这12年中，不仅大学和历史研究面貌一新，甚至高中历史课程同原来相比也发生了本质的变化。这些事实所产生的效果，到了以后还在继续深刻地规范着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对于纳粹时代的认识。而战后的日本却不存在这样的时代。另一方面，在日本的传统社会中，不存在德国那种愤世嫉俗或要求自我正当化等因素。谈起本国所犯的罪行时，日本人比德国人要感到困难得多。这与以上提到的事实有关。（德国人对自白的热情，能够认为其思想根源在于天主教的忏悔制度。认为有了罪行，只要忏悔就能得到赦免和宽恕。日本不这样，它没有这种传统，日本的天主教中不存在这种赦免制度，这有其原因。德国新教的创始人马丁·路德，曾称教会是“谈论之家”，对于他来说教会首先是百家争鸣的场所，欢迎这种活跃的谈论。另外，路德还把教会中心从祭坛转变

为说教的讲台。新教谈论的话题的重要性、感染力和有效性，在日本文化中是看不到的。)战后 50 周年，关于这一论题，在德国费尽了口舌（参见第八章），但它所表现出来的是，通过闲谈或气氛严肃的研讨会，或者通过数不清的与主题无关的细枝末节的展览会，简言之，通过央求的语辞，终于使人们缄口不语了。这样一来，那些麻烦的问题，也就被轻描淡写了。

而日本采取了后一种做法——保持“沉默”。直到 1994 年 5 月，法务大臣还说：“人们把太平洋战争说成侵略战争，那是错误的。”因为日本的目标是要实现“殖民地的解放”，正是为了这一目标，才要建立“大东亚共荣圈”。在他担任法务大臣时，官员们历时几年都未能发现的文件，不久前终于被一位历史学家（中央大学的吉见义明教授）在短短的几天之内就在政府管辖的公文馆内发现了。那是一份命令设立“性慰安所”的正式文件，上面盖有日军最高司令部的印章。而那些与此文件有关的资料，在此文件被发现之后，仍不对研究人员开放，法务省负责人说出的理由是，“这是为了保护有关人员的个人隐私”（1995 年 7 月 26 日的《日本时报》）。

不过，如果有人认为德国不会发生此类事情，那么他就暴露出了自己对战后德国司法界历史的无知。战后西德司法界虽然曾对受害者做过一些赔偿，但与此相比，他们对犯罪者的保护却更是煞费苦心了（参见第一

章和第七章)。不过，政府高级官员无休止地反复发表那种丑闻式的“言论”，这类现象，在德国是不存在的。在外国，其中像在 1910 年到 1945 年间遭受日军“解放”的韩国这样的国家就不得不提出这样的问题：在这 50 年里，什么都没学而虚度岁月的人，难道仅仅是几个老年人吗（如果这样，按照生物学的必然性，问题很快就会自然解决了）？难道在战后的学校教育中一直在公开灌输着以上见解吗？

但是有一件事是很清楚的，那就是在目前这种状态下，在这个问题上，外国人对日本所持的始终如一的否定态度，是绝对不会动摇的。日本舆论界如果仍然忠实地接受那位法务大臣的见解，而不能觉悟到作为一个国民的义务，甚至作为世纪公民的义务。或者说学者们如果不能更好地发挥自己的自主性，那么外国人对日本形成的否定性形象是绝对改变不了的。为了不造成遗憾，就要有具体的行动。经济上的赔偿和谢罪，本来应当受到欢迎，可是在动荡不安、政权更迭频繁、且任何人都难以推测下任总理能否信守上任总理所做的谢罪诺言的国度里，倒有比经济赔偿和谢罪更加重要的举动，那就是要使社会懂得自己的过去。如果日本社会不能用自己的双手来克服自己的过去，那就只有由外国采取强制手段来行使这种克服了。另一方面，日本舆论是有权了解向广岛和长崎投掷原子弹的真正理由的，也有权了解美国政府为什么不追究那些采取了并不亚于纳粹的非人手

段，在中国残酷地进行人体实验，即那些隶属于日军 731 部队的“学者们”的责任。从这一点来看，美国社会也应主动地着手解决这一问题。

尽管这样说，本书所写的关于克服过去的问题，主要并不是指日本和美国，而是针对德国（但是，作者希望本书也能对日本读者提供一个重新认识本国历史和社会的作用。例如读一下第三章“德国和波兰棘手的邻邦关系”，就会使你感到，有必要重新考虑一下日本和韩国的关系。）。下面，为了使你能更好地认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能够动员德国国民参加战争的纳粹党的本质，首先对该党自我命名的情况做一简单的说明。

“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National Sozialistisch Deutsche Arbeiter - Partei）”（NSDAP，“纳粹党”）这个名称，带有某种欺骗性（在政党定名时常有这种事情）。首先是位居名称开头的醒目的“国家”一词，就包括了对以下人们的阐述，即在 1914 年至 1918 年间打了败仗（如他们自己所说，那次失败说到底还是德国政治家的责任，并不是由于德军的软弱），以后成为社会主流的具有和平主义政治倾向并持以若明若暗的敌意，为国家意识明证的人们。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通过在名称上冠以“国家”一词，来达到使人们视自己为国家利益和传统的捍卫者的目的。

“社会主义”是为稳定当时被经济危机冲击得动荡不安的人心而不可缺少的一个词语。因为当时人们对这

个时代、对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感到了强烈的不满，大多数国民都热切地盼望着实现社会主义的社会秩序。因此，该党便举起了“社会主义”这一旗号。同时这样一来，也对当时声势浩大的工人运动做好了分庭抗礼、争夺正统的准备。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为了使马克思主义阵营威信扫地，他们反复地无休止地中伤马克思主义是什么“犹太化了的”假社会主义，能够取代马克思主义的潜在的新的社会主义学说就是“国家社会主义”。这个国家社会主义，或者说“德国式的社会主义”，能够向工人、中产阶级、军人和企业家等，按照他们的需要提供服务。但是，它却与马克思的社会主义不同，当时还不存在带有学术基础的这种概念体系。

“德国”一词，不仅表明了该党的领土扩张的要求，继而又把“工人”一词加在一种特殊的文脉中。“工人”一词当初含有一种特殊含义，它和“士兵”这个“荣誉称号”一样，必须要赋予那些因战争和经济危机而从稳定人生轨道上坠落下来的数百万之众。在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宣传牌和传单中经常使用的“各位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等这一号召性词语，不仅针对着具有自觉的工人觉悟的阶层，而且也针对着完全搞不清自己本来归属何方的各个阶层。对所有这些人都提出了要求——应该养成称自己是“德国工人”的习惯。不言而喻，在这一表述中，包含着一种同具有“无祖国”意识的国际工人阶级的“工人”一词相对抗的含义。